

外 国 学 者

论亚细亚生产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

(上、下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七二五厂排版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4¹/₂印张 532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400册
统一书号：3190·021 上、下册定价：2.70元

目 录

下 册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

.....[苏联]B·H·尼基福罗夫(1)

列宁论亚、非国家的社会关系

.....B·H·尼基福罗夫(17)

二十世纪二十年至三十年代

苏联历史学界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

讨论(1925—1931年)

.....B·H·尼基福罗夫(28)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总结

.....[苏联]M·戈杰斯(56)

二十世纪六十年至七十年代

《东方和世界史》序言

.....B·H·尼基福罗夫(102)

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前景

.....[法国]J·谢诺(116)

关于奴隶社会制度的几个问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R·贡特尔
G·施罗特(147)

古代史分期问题：把古代东方和 古代美洲纳入世界史的发展过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E.C.韦尔斯科普夫(168)

公元前第一千纪初中国的土地关系

.....[苏联]Л.С.瓦西利耶夫(187)

中国周代土地所有制的状况

.....[匈牙利]F·托凯(225)

热带非洲的传统社会和马克思主义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

.....[法国]J·休列-卡纳尔(257)

殖民地化以前马达加斯加社会的土地权

——“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

.....[法国]P·布瓦多(275)

美洲印加人、阿兹蒂克人和马雅人的

农村公社

——“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

.....[法国]S·戴桑蒂斯(297)

具体历史的证明.....B.H.尼基福罗夫(313)

《东方和世界史》结论.....B.H.尼基福罗夫(377)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

[苏联] B·H·尼基福罗夫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心目中最有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时间是卡尔·考茨基。然而恰巧在阶级社会和国家起源的问题上，考茨基的观点实际上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本人也明确证实了这一点。考茨基说他关于阶级和国家形成的理论产生于1876年，并且把他的理论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路德维希·贡普洛维奇与弗兰茨·奥本海默的影响联系在一起。1877年问世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动摇了考茨基的信心，但是并没有促使他放弃原先的观点。后来，当考茨基象以前那样不再考虑恩格斯的权威时，他公然用自己的观点对抗“恩格斯的假说”。同时，他曾诚实地附带说过：“我在这里称作恩格斯假说的东西，正是马克思同意的观点”^①。考茨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是他在晚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唯物史观》。

贡普洛维奇、奥本海默和接受他们理论的考茨基，都只

^① 考茨基：《唯物史观》，《国家与人类的发展》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下同）第63页。

用一些部落和部族被另外一些部落和部族所征服来解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贡普洛维奇强调指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国家不外是通过一个或几个结成联盟和联合在一起的部落奴役别的部落的途径产生出来的。”^①

早期阶级国家通过一些民族被另外一些民族征服而形成的本身是一个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产生的结论毫不相干的事实。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这里所说的可能只是毫无疑问在征服以前很久就已经开始的那个过程的最后阶段。为了征服别的部落和使它受自己统治，胜利者必须拥有现成的（哪怕是原始的）国家机器、某种军事组织。如果不达到一定的生产水平，如果剩余产品没有或多或少明显的积累，则军队、官吏的产生便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说征服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况且，关于征服别的部落以迫使它为征服者劳动的思想，在平等的公社成员头脑里是不能产生出来的。这类思想的出现证明公社成员已经知道了一些人为另一些人劳动的情况。不过这就意味着，在该社会已经产生了剥削关系，已经有了阶级——虽然还是不发达的、暂时还被原始社会组织的形式掩蔽着。如果不存在这些前提，就无法解释何以一个部落被另一个部落所征服，除非公社成员的头脑里产生了莫明其妙的想法。

考茨基曾经正确指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相同）无论在1877年的《反杜林论》中，或者在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都强调阶级的形成在理论上先于国家的建立。但是，考茨基并不真正了解恩格斯在这里谈的是阶级形成的早期阶段，即当时远远没有完成的那个过

^① П·贡普洛维奇：《社会学基础》，圣彼得堡1899年版第184页。

程。考茨基并不了解这一点，而把很晚才出现的质的飞跃（此时国家已经基本上形成，阶级的存在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的），当作这个过程的开始。

考茨基断言：“虽然剥削不只是有了国家才出现的，还在国家出现以前，就存在奴隶劳动和掠夺别个部落的现象，但是，只是由于产生了国家，由于用暴力把被征服部落统一在一个大社会中，归胜利者统治，在公社（奴隶不属于这种公社）内部才出现了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从这时起，在同一个社会内部便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国家政权直到这个时候才带有它的这种起源的烙印，并且归根到底是社会内部任何剥削关系的基础。”^①

下述全部论断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阶级矛盾和剥削倒是国家产生的结果。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暴力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作过令人信服的驳斥。考茨基就是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来看待亚非国家社会制度的问题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毕生都坚持这种观点。

必须预先说明，考茨基不仅没有专门研究过东方，而且在他的一些普普通通的著作中也只用很少的篇幅叙述东方。因为第二国际的其他一些理论家几乎没有注意过东方各国的问题，因此，即使考茨基的个别意见在他们看来也有重大意义，被认为是指导性的。

“暴力论”的思想是对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估计不足。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自然深深赞扬下面一种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东方社会是由因循守旧、没有内部财产上不平等现

^①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146页。

象的公社所组成的；在那里，据说国家与阶级没有联系，国家起着独立自在的作用，也可以这样说，纯暴力关系起着统治作用。考茨基正是这样领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假说的，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这个假说绝不意味着对经济因素估计不足。如上所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在假定的亚细亚社会内部，经济关系并不明显；当这个问题被弄明白以后，他们便放弃了以前的假说。相反，考茨基则由那个假说最初的变种走向了唯心主义的“暴力论”。

考茨基并没有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现摩尔根的著作以后对东方社会的观点的改变。难怪乎他后来还叙述过“恩格斯、马克思、摩尔根的假说”^①。特别有意思的是，考茨基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世三年以后，形成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而根本不考虑恩格斯的概念。考茨基基本上是重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50年代泛泛地采用过的关于“亚细亚”社会的论述。在考茨基的笔下，东方社会是作为专制主义基础的闭塞公社的混合物；公社制度是东方保持不变性的原因。考茨基完全按照关于亚细亚制度的旧观念，断言东方社会“不存在能使它上升到较高阶段的力量”^②。

按照作者的认识，东方的诸次人民起义只是赋税引起的。不错，考茨基毕竟打算把“暴力论”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发挥的概念吻合起来，他最初企图说明诸公社之所以在一个权力下联合起来，不仅是由于战争和征服，而且还由于生产、交换和对东方各国起特殊作用的人工灌溉。^③ 他

① 考茨基：前引书，第63页。

② 考茨基：《现代民族》，苏联《新时代》1887年第8—10期第309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394—395页。

也叙述过东方各国的“贵族”（战士，建筑师，天文家）。①

后来，考茨基公开背离马克思主义以后，稍微修改了自己原来的假说，缩小了人工灌溉在这个假说中的作用（因为他指出这个问题不明显），更加突出了征服的意义，因为“只有征服才使中央政权获得了调整水利经济的力量”②。

考茨基本人关于东方各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意见虽然为数不多，但在他看来，这些意见都是有创见的理论。例如，按照考茨基的说法，他从马克思关于治理河水在埃及和印度所起的历史作用的观点出发，断言：“对尼罗河与恒河正确的东西，对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长江与黄河流域也是正确的；不只埃及王国和印度王国、而且中国和美索波达米亚王国的物质基础部分地是必须对河水实行治理，这也就部分地说明了东方专制国家产生的原因。”③

考茨基反复使用的“部分地”一词想必强调的是：占第一位的是产生东方专制国家的主要（从他的观点来看）因素——直接的暴力，即征服。

实际上，考茨基如果不是特殊的“亚细亚”社会假说的发明者之一——看来他觊觎这个称号——，那么，无论如何也是他恢复了已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摒弃的这个假说，并且赋予它以非唯物主义的特征。④同时，考茨基对古代地中海社会的评价也是有其特点的。他写道：“荷马笔下的英雄和中

① 参看考茨基：《现代民族》，苏联《新时代》1887年第8—10期第396页。

②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208页。

③ G·普列汉诺夫：《文明和巨大的历史河流》，《新时代》1890—1891年第14期第447页。

④ 参看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莫斯科1917年版第5—6、50、64页。

世纪骑士之相类似不是偶然的，这种类似到处都是产生自社会条件之类似。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也和基督教-日尔曼中世纪时代一样，主要军事力量是不靠任何军事长官的赏赐、而靠自己农奴的劳动为生的大地主。”^① 在考茨基的著作里，荷马时代并没有Л·Г·摩尔根笔下的“军事民主制”，而有的是“骑士”、“农奴”、“基督教-日尔曼中世纪”，即封建主义。在这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影响是不容争辩的，因为凡是存在政治割据的地方，他们便总是说那是封建制度。考茨基在这里所作的结论的认识论根据，也就是他在评述东方社会时的根据：暴力论、对上层建筑因素（国家、中央集权）估计过高和对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估计过低。

第二国际另一位大理论家Г·В·普列汉诺夫对东方也稍微有所论述，虽然他比考茨基的论述大概要多一些，因为他在研究改革前俄国的社会关系问题时，特殊的“亚细亚”社会的假说使他极感兴趣。

大家知道得很清楚，普列汉诺夫是由民粹派走向马克思主义的。1883年以前，他同意所有民粹派分子共同具有的关于公社特殊作用的错误认识。例如，他在批判地分析М·М·科瓦列夫斯基的一本著作时，断言公社本身并不具有解体的因素，它瓦解的原因始终“不在内部，而在公社外部”^②。普列汉诺夫所谓的外部（对公社而言）因素，既指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所征服，也指国家政策。

普列汉诺夫与民粹派决裂以后，在评价公社和国家时仍然保留某些旧观念。例如，他在1892年写道，现在这种样子

①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59页。

② 普列汉诺夫：《土地公社及其可设想的未来》，《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3年版第1卷第107页。

的俄国公社是国家的政策造成的：土地曾经是祖传下来由农户中的个人占有，但是随着国王的国家权力和纯粹东方专制主义的发展，固着于土地的农民便丧失了历来对土地的权利，土地开始不被认为是农民的，而是国家的，或者说得准确点，是国君的。作者认为，国家强行建立了新的公社^①。同时，普列汉诺夫把沙皇俄国的社会制度与古代埃及社会相提并论^②。

虽然普列汉诺夫批评Л·И·梅赤尼科夫从自然因素的作用直接引伸出社会制度的特点，但是，众所周知，他本人也在某种程度上过分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这在许多方面也说明了他为什么坚信特殊的“亚细亚”制度假说，如上所述，按照这个假说，东方各国（从他的观点来看，包括俄国在内）的地理特点在特殊的“亚细亚”制度的产生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普列汉诺夫认识列宁以后，他们两人对于历史过程的观点立即发生了冲突。不过只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以后（当时两派之间在俄国革命的土地纲领上进行了激烈争论），普列汉诺夫才最后形成了关于亚细亚（和俄国）社会的概念。1906年3月，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中断言俄国的“旧制度”是作为所有伟大东方专制国家基础的“经济制度的莫斯科版”，当时，“土地也好，农夫也好，都是国家的财产”^③。他说俄国产生这种制度是由于蒙古人压迫的影响，因为蒙古人压迫带来了“太多的中国东西”^④。根据《社会

① 参看普列汉诺夫：《全俄国的毁灭》，《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3年版第1卷第348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346页。

③④ 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1906年3月），《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15卷第31页。

民主党人日志》的上下文可以判断出，作者所采用的基本史料是Г·列克柳的《世界地理学》。普列汉诺夫在引证列克柳关于十一世纪中国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叙述时，正确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列克柳在这里是针对社会民主党人而言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各种意图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头脑里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形象。^① 虽然如此，但是普列汉诺夫本人仍然以中国“土地国有化”的失败这张王牌作为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土地国有化口号的理由。普列汉诺夫仿佛认为，实行土地国有化就是“国家这个庞然大物”重新奴役农民。^②

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这一著作中，企图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来说明他的“亚细亚”制度。普列汉诺夫在引证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原理时，和考茨基一样，并没有隐瞒这个事实：在摩尔根的研究著作问世以后，马克思主义两位奠基人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但是和考茨基不同，普列汉诺夫没有用自己的理论对抗“恩格斯、马克思、摩尔根的假说”，而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解释，他说：“必须认为（！——本文作者），当马克思后来得知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那本书以后，他大概（！——本文作者）便改变了自己对于古典生产方式与东方生产方式的关系的观点。实际上，封建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的逻辑导致了以资本主义胜利为标志的社会革命。但是，例如中国或古代埃及经济发展的逻辑全然没有导致古典生产方式的出现。在前一种情

① 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同志》第5期（1906年3月），《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15卷第32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36页。

况下，是指两个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阶段接着另一个阶段，而且是前一个阶段产生的。我们认为，后一种情况很可能是两个同时并存的经济发展类型。古典社会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发生在东方社会制度的产生以前。这两种类型的经济制度中的每种类型都是氏族组织内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最后不可避免地必然导致它瓦解。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别，那末，它们主要的和最后的特点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地理环境在一种情况下给已经达到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的社会规定一套生产关系，在另一种情况下则规定与前一种极不相同的另一套生产关系。”①

上段行文中的“必须认为”和“大概”这两个词明显说明普列汉诺夫的下述论断是毫无根据的。他说，他关于古典生产方式和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两种“同时并存”的生产方式的概念似乎是来源于马克思。

我们在这里且不谈按照地理原则这样区分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的问题（上文已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只限于断定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没有掌握马克思或恩格斯任何一条直接或间接的意见，似乎表明他们在1880年以后开始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成一种与古典世界并存的东西。

从下一例子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本人对于“亚细亚”社会的观点是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在上面摘自《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那段文字中，他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认

①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3年版第18卷第216—217页。

为封建生产方式发展的逻辑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在这方面，他把封建主义与“亚细亚”制度对立了起来。在《俄国社会思想史》这部著作（普列汉诺夫在这部著作中发表了替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辩护的第三种说法，这是他所有言论中最没有根据的一种）中，他说道：“埃及、迦勒底、亚述、波斯、日本、中国都经历了封建主义”^①。在这里，作者不是把封建主义说成“导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而是一种以政治分割为特征的国家政治制度。因此，所得到的结果是，在政治分割时期，上述国家的社会被描述成封建社会，一旦政治分割被中央集权所代替，便似乎意味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确立。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出色地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实践上却成了唯心史观的俘虏，这是令人惋惜的。

如果说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在某种程度上还背负着他们旧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观点的残余，那末，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加入国际社会民主党队伍的年轻革命者，在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时，便能够完整地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并且一开始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在马克思的晚年所取得的最后成果。这些年轻人通常是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识世界历史上社会形态更替的具体图式。

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写出了A·A·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简明教程》，该书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俄国传播得十分广泛：从1897至1906年该书出版过十次，后来在

^①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20卷第11页。

1919至1924年，仅官方就出版过六次（实际上还要多得多）。在图拉森林工人小组的课堂上产生的第一版中（1897年）^①，作者实际上表述了恩格斯的“五阶段”公式（第一版没有提到第五种形态——社会主义形态，是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造成的；仅仅到1905至1907年革命年代的普通版本中才出现这一形态）。

但是波格丹诺夫并没有停留在第一版的说法上。作者动摇不定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思想演变的一般阶段，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波格丹诺夫的概念后来对部分苏联作者产生过影响。《经济学简明教程》的结构经常变来变去，但是彼此截然不同的几种基本说法可以在第一版（1897年）、第二版（1899年）和第十版（1920年）中看出来。为了对比起见，现将这几种不同说法列举如下：

第一版	第二版	第十版
(1) 原始氏族共产 主义时期； (2) 奴隶制时期； (3) 封建主义和行 会时期； (4) 资本主义。	(1) 原始氏族共产 主义； (2) 父权制氏族社 会组织 古代奴隶制； (3) 封建社会； (4) 小资产阶级 社会； (5) 商业资本时 代。	自然经济 (1) 原始氏族共产 主义； (2) 专横的氏族公 社； (3) 封建社会。 交换的发展 (1) 奴隶制度； (2) 农奴经济； (3) 手工业——城 市制度；

^① 参看A·A·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莫斯科1897年版。

续表

第一版	第二版	第十版
	(6) 工业资本主义 ——工场手工业阶段; (7) 工业资本主义 ——机器阶段。	(4) 商业资本主义。 工业资本主义; (1) 工场手工业时期; (2) 机器时期; (3) 金融资本。 社会主义社会。

如上所述，作者在1899年开始背离恩格斯的概念。这是修正主义在西欧（1896至1898年伯恩施坦的言论）和俄国（经济主义——1897至1898年）发动进攻的时期。1899年出版了B·A·巴扎洛夫的《生产劳动和形成价值的劳动》①；作者修正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他企图把生产的目的和交换关系与这个概念对立起来。用波格丹诺夫的话说，这一概念对他有一定影响（显然，在巴扎洛夫的小册子出版以前，波格丹诺夫就知道了它的内容，因为他在图拉从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时便认识了作者）。

在波格丹诺夫的教程的第一版里，奴隶制度处于原始公社制度和封建制度之间，是与二者具有同等价值的一个阶段。古代东方和地中海被解释成为奴隶制度的变种。对于亚洲专制国家的这种解释是以下述论断为根据的：在亚洲，每

① B·A·巴扎罗夫：《生产劳动和形成价值的劳动》，圣彼得堡1899年版。

个臣民都是国家的奴隶，而专制君主和官僚机器则是奴隶主阶级的体现者。第二版保留了东方和希腊-罗马世界具有共同社会形态属性的论点，不过社会形态的整个图式根本改变了。作者把原始公社制度分成两个阶段，而使“古代奴隶制”时期与原始时代的第二阶段（“父权制氏族社会组织”）相接近，从而把对抗性的阶级社会和无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明确界限弄模糊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也被弄模糊了，因为在它们之间插进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只有把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分成工场手工业阶段和机器阶段的做法才可以认为是恰当的——在这里，分类的基础是生产原则。但是，按照交换经济发展程度的特征来确定的“商业资本时代”则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期标准。划分出这个时代的思想后来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摒弃了。

在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波格丹诺夫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期。按照作者的意见，封建主义是从原始制度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两个阶级由于自然性质的经济而联系在一起；相反，“古代奴隶制”被排除了，在教科书的第二版里甚至没有给它辟出单独的一节。但是在这一时期，波格丹诺夫在自己的图式里仍然把“古代奴隶制”时期保留在原来的位置，即保留在原始时代和封建主义之间。

在第十版里，我们见到的完全是另一个波格丹诺夫，他经历了和列宁主义进行残酷斗争的年代、脱离了党、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唯心主义体系。与这种唯心主义体系相适应的是他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新分期，他的这种分期是不顾历史年代前后顺序而彻头彻尾地按照交换关系发展的原则划分的。二十世纪初期作者在他的某些著作里提出来的关于“交换”社会必然从“自然”社会发展出来（其中包括奴隶占有制必然